



论新世纪文学中的“存在焦虑”书写

韩宇瑄, 伊艺飞, 黄 健

(浙江大学中文系, 杭州 310028)

摘 要: “人的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核心理念, 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旨归。新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其旨归与现当代文学一致。新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 新世纪文学产生若干新质, 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诉求体现为对“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的“存在焦虑”的探讨, 并体现于不同题材的作品中, 产生了丰厚的创作实绩。中国新世纪文学作品对终极关怀的广泛关注, 不仅反映出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更因其描摹世情、探索人性的品格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给人带来全新的期待。

关键词: 新世纪文学; 存在焦虑; 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4-0128-08

On the writing of "existential anxiety" in th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HAN Yuxuan, YI Yifei, HU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Human literature" is the core concept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destiny is the consistent aim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s part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has the consistent aim with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century, along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new qualities.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 destiny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Where did I come from?" "Who am I?" and "Where will I go?" Besides,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works with different themes, and rich creatio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roduced. The extensive concern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works for ultimate care not only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literature, but also brings new expectations to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cause of its depic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character.

Key words: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xistential anxiety; ultimate concern

收稿日期: 2018-10-0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12YJA751023)

作者简介: 韩宇瑄(1991—), 男, 甘肃兰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黄 健, E-mail: simonhj@sohu.com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核心理念,“人的文学”在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向深层次开掘。从五四“问题小说”对于人的生存境况的描写,到“新时期文学”^①对于人性的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人的书写步步深入,在新世纪的一批文学作品中则体现为对于人的“存在焦虑”的深度探寻。这种“存在焦虑”与新世纪人的生存状态相映衬,不仅为文学带来新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新世纪文学”^②命名的合法性,亦为新世纪文学带来更加深厚的人学底蕴。所谓“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是在人本主义化进程中,“人类在面临自身存在困境时的一种情绪状态,它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弥漫性”^[1]。凡危及个人生存的因素或危及与生命有同等价值的信念和理想的因素,都会导致此种焦虑。^[2]由于文学艺术本身的审美自由与外在时代之间的巨大张力,文学艺术在文艺与时代、商品性与娱乐性、审美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之间的运动与游移为文学艺术表达时代的存在焦虑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3]398-416}。简单来说,对于“存在焦虑”可以用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归纳概括,即:“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在“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化”和“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影响”所造成的异化愈发严重、全球化引发对人类普世价值追索和反思的新世纪现实文化语境中^{[4]1-6},新世纪文学对于“存在焦虑”的书写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我从哪里来”的重构:新世纪文学历史题材的终极关怀书写

“我从哪里来”,关乎我们时代的成因与来路,是新世纪文学“存在焦虑”书写的第一个维度。这一维度主要体现为革命历史题材的重构与突破,其本质是通过一种历史观的重构,来寻觅新世纪人对于历史来路的焦虑与不安。这样的寻觅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迹可循:一方面出于为历次革命实践寻求合法性的冲动,另一方面也由于对当发言的多重禁忌,当代文学在其起始阶段便特别偏爱革命历史题材,甚至与农村题材成为并峙的双峰。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逐渐趋冷,而革命历史题材却依然保持着“正典”的地位,继续承担着“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5],保持着常写常新、佳作频出的势头。这一方面源于中国人偏爱历史叙事,讲求“以史为鉴”“以古鉴今”,另一方面更是对于既往历史不断观照的结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对新时期以

来史观的不断更新与转向,新世纪人在观照革命历史的同时难免感到困惑,当一个社会出现群体性的“我从哪里来”的困惑时,对于历史的焦虑与有关存在的虚无无疑动摇着新世纪人的存在之基。因此,对于新世纪人而言,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无疑具有更加明确也更加迫切的反思作用和指导意义,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反思也往往围绕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展开。而针对表征不同的历史时段,新世纪文学的作者们也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策略。

不论在何种史观下,1840年均被公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华文明在自给自足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超稳定结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英、法等列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而这新生的过程开启了轰轰烈烈且影响深远的中国革命,今日中国便是这样一场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现代性追求,1840—1919年被称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时间的久远以及主流史观对于这一时段革命行为态度的暧昧,这一时期的历史曾长期被当代文学所空置。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史料不断丰富和史观的变革,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新世纪文学触及,成为新世纪探寻“我从哪里来”之起点。张炜的《独药师》便是反映这一时期革命历史的作品。作品围绕养生世家传人季昨飞展开,他在动荡的历史变

① “新时期文学”概念由蒋守谦最先提出,尔后由黄平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黄平看来,“新时期文学”真正的历史起源是来自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提出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某种程度上,“新时期文学”在被纳入“新时期”历史脉络的同时,也直指深嵌在中国当代历史脉络中的现代性。“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在于重新理解近四十年来的“现代化”的起源,这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还意味着文学有力量以形式结构穿越历史结构与情感结构,通过文学能够有效地展示当代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中的我们的生命体验。参见: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J],文学评论,2016(1):78-87。

② “新世纪文学”概念由雷达等最先提出,在得到众多学者附和后被广泛使用。在雷达等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世纪文学已经和正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应继续沿用已经使用了二十七年的“新时期文学”概念。按照雷达的说法,“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对文学阶段的指称从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依赖变成对时间的依赖,从而在潜意识里解构了中国新文学以来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以便充分地展示新世纪文学在自律与他律的和谐中构筑未来的发展蓝图,而对于人性更高和更深层次上的追索无疑是其题中之义。参见: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J],文艺争鸣,2005(3):6-16。

革之际,在经历了养生、革命、爱欲的沉沦与纠葛后,最终选择了苦修、苦行和苦恋。但该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描写养生秘术的种种细节,而着眼于季家兄弟及其背后的半岛养生传统与革命党所秉持的终极关怀的冲突。季昨非的老师——邱琪芝与季府的先辈们坚持认为,死亡不仅荒谬而且可以避免,人在乱世中唯一值得做的只有一件事:养生;而季昨非的兄长徐竟则认为,流血牺牲在所难免,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养生,尊奉革命领袖孙中山为“独药师”。主人公季昨非作为养生名门季府的第六代传人,既要接续前一种对人存在的关怀,使季府的养生事业得以延续,又几次帮助徐竟,试图理解革命党人所代表的别样关怀。作者无疑深刻认同着革命者所秉持的终极关怀,但也并未轻易否定养生者的终极关怀,而是竭力发掘其身上的人道美、神秘美,呈现出一种包容大度、拒绝对立的终极关怀观。无独有偶,同样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檀香刑》也选取了这种不同价值关怀、多声部合唱的策略。在《檀香刑》中,孙丙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革命关怀,孙眉娘追求爱欲、解放个性的情爱关怀,赵甲建功立业、忠君守责的事业关怀,钱丁爱民如子、为民立极的士大夫关怀,都以高密东北乡的义和团运动为线索,聚集在晚清外敌入侵、中外勾结、义和团反抗的历史天空下,形成一曲多声部、多层次的合唱,作者在其中并不做任何褒贬,而是如实地以不同人物的视角轮流观看历史现场,令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秘辛扑朔迷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被视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历史内容。由于其在当代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相继对其进行了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书写。新世纪中,这样的书写模式仍然存在主旋律历史题材之中。但在新世纪语境下,随着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有关这段历史的本质化书写逐渐被更加多元的历史存在解构。李洱的《花腔》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小说的故事主体发生在抗日战争之中,但其前后延展却可辐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故事旨在讲述复杂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的命运与历史错位的结果。主人公葛任是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一直在为个体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然而,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葛任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是目睹革命的残酷后对革命心生厌倦,希望归隐山林、专心治学也不可得,因为政治力量已经为其打上了“民族英雄”的烙印,为保其名节,他需要死,也必须死。小说

通过三个与葛任死亡息息相关的当事人在历史不同时段自述,构成了对以革命现代性作为唯一历史动因的叙事脉络的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现代性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两面性——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的一种终极关怀,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因率先觉醒的批判精神引发了革命,然而革命的进程却偏离了最初预设的轨道。当启蒙者伦理和革命伦理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知识分子的悲剧也就开始了:点燃革命之火,又被革命之火烧为灰烬。这是“启蒙现代性”被“革命现代性”所置换的悲剧,也是两种不同存在价值降临于个体身上所产生的悲剧。除此以外,在葛任的悲剧中,我们还看到一种作者所隐含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态度,正如书中葛任在诗中所说:“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那无数个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由于其当代史性质,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已经有过不厌其烦的讲述,而在新世纪文学中,由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反思框架和反思口径,这一时期的历史也曾不同文学史阶段得到过相当深刻的反思,因而在新世纪文学中突破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王蒙的《这边风景》。这部原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反映新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与斗争的小说,直至2012年才获得出版。对于这部“失而复得”的手稿,王蒙尽可能使作品维持原貌,仅在阶级斗争、反修斗争和崇拜个人的风气等方面做了弱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每章最后,王蒙都新增了一段“小说人语”,这样一来,在这部小说内部,便形成了来自两个不同时代的存在观念的“对话”,小说的正文秉持的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并以毛泽东“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为旨归的革命斗争终极关怀,而新世纪撰写的“小说人语”张扬的则是一种抒发时间感慨、赞颂民族友谊、发掘人性光辉的人文主义终极关怀。在书中,两种不同的终极关怀并不对立,也并不冲突,他们在小说中以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表达出作者“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除了这些集中书写某一历史阶段的历史反思小说,在新世纪文学中,在复杂历史和多元现实的共同作用下,一些作家重新燃起了历史书写的“史诗性”冲动。这种构筑革命

历史的宏大史诗的创作激情,在新世纪文学中再次达到了高潮。

与新世纪历史小说总体面貌保持一致,新世纪史诗题材作品不再沿袭以往同题材小说作品中本质性的终极关怀,而在看待历史的终极关怀上采取开放和反思的姿态,与先前的本质性关怀形成对比与对话。在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中,小说的叙述时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延伸到六十年代,在后现代的碎片化历史观照下,刘醒龙选择了重构历史的工作,而这种重构历史的精神资源就来源于作者所秉持的人文主义终极关怀以及人存在于世的根源性焦虑。在革命的杀戮和人性的悲悯之间,刘醒龙选择了后者:在刘醒龙看来,人是一种易碎品,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只有真正的悲悯,真正将人当成人,才是不公正的社会的终点。这样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立场不仅为历史注入了新质,也为小说提供了某种超越性的因素,小说也被称为“一部重构中国20世纪历史的作品”。而莫言的《生死疲劳》所书写的历史则从建国初一直延伸到了千禧之年。小说中,在土改中被杀的地主西门闹经历了六道轮回,不断托生成为不同动物,而与西门闹的轮回同步,西门屯的历史也经历着一道又一道的轮回。原来被否定的,后来被肯定了,原先神圣的,后来被褻渎了,原先在天堂的,后来堕入了地狱,而西门屯也凝结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的历史终极关怀无疑是循环的,所有的意义在循环中都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而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发展的,则是人类无止境的贪欲。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世纪的历史反思小说之中,作者们不再热衷于将历史叙述系于某一主人公,使之成为具有结构功能的线索式人物,而更倾向于将历史书写的脉络集中于某一特定场域,叙述视角也由单一变得多元,体现了新世纪历史小说在揭示人性终极关怀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避免了线索人物平面化带来的故事叙述上的碎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世纪有关历史观的来源“存在焦虑”同质性和终极关怀多元化的特点。

二、“我是谁”的彷徨:新世纪文学中的自我认同焦虑

自我认同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更是有关存在的核心议题,在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日益受到关注。现代化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过程,一方面,随着现代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主体力量日益得到确证;但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没有使人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世界空虚化,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普遍地出现了“存在焦虑”。事实上,自我认同焦虑在现代性高度实现的新世纪,有其必然性。现代性作为一项不断推翻现有存在方式、不断完善的进程,将变动的因素注入到社会生活当中,人们因此需要不断更新对所有事物的固有认知。“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人,在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在都市化的流浪、归属感的淡化中,在权威的不断消逝、身份感的不断模糊中,深陷于‘我究竟是谁’的追问。”^[7]

在新世纪文学中,底层的被发现意义重大。建国后,在平均主义的社会构架中,人们只知有阶级而不知有底层。实际上底层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底层中的许多人虽然承受着苦难,却对自我没有正确且清醒的认知。新时期伊始,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地位,一个自我认同焦虑的故事便由此展开。例如,在曹征路的《那儿》中,面对社会的转型,小舅仍然抱着“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执念,家族的革命基因,工会主席、省劳模的地位以及过往因自己的工人地位所取得的荣誉,使他无法正视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种种乱象,执意上访。小舅在资本和权力合谋形成的无物之阵中撞得头破血流,在终于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神话已经破灭后惨烈自杀,以自己的生命为一直以来坚守的“那儿”殉道。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尚且如此,落后地区农民的自我认同更是岌岌可危。在《马嘶岭血案》中,九财叔天真地认为地质队开出的一个月三百元的报酬是发财的良机,但来自城市的地质队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使九财叔自惭形秽,而地质队人对于九财叔工资的扣罚以及提防的态度终于使他认识到城乡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原有勤劳致富的自我认知崩塌,最终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七名地质队员,企图以此致富。在原有平均主义想象的终极关怀中,工人和农民本是社会建设的主导力量,但在新世纪现代性的洪流中,自我身份认同破灭,使其原有自我认知瓦解动摇,最终产生了自我毁灭的悲剧。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在儒家文化影响与宗族社会的治理实践中,中国的乡村社会形成了独特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乡村居民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个人身份认同。即使是在启蒙

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先后渗入乡村,掀起轰轰烈烈的乡村改造运动后,传统的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仍然顽强地运行。换言之,“革命口号、乡村的经济水平与农民主体之间出现了脱节”^[8]。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国家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乡村社会受到现代化工业的猛烈冲击,农民的个体身份焦虑也日益凸显。在贾平凹的《秦腔》中,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强烈冲击,乡村世界一派凋敝,旧的东西消逝了,新的东西却迟迟未萌生。这种现象反映在经济上,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从土地上出走;反映在文化上,则是如秦腔这样的传统艺术无人问津,走向消亡。乡村的凋敝说到底还是农民个体身份认同焦虑的体现,中国的农民是勤奋的,也是实际的,当他们发现原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便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农村走向败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农民的身份认同焦虑并非一朝一夕,事实上,他们对自我身份变动的努力在“文革”时期的农村改造运动之中就已默默地开始。在毕飞宇的《平原》中,端方对上高中的要求,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对当兵的向往就隐含了自己不再愿意如父辈一样安于乡土,终日在农村度日的主观动机。而端方漫无目的的追寻及受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印象之中“文革”史显露出的某种空洞与苍白,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国人的身份认同看似铁板一块的时候,农民身份认同的忧虑便已经开始出现。

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在新世纪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焦虑的表现也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直接,更富有深度。伴随着新世纪物质文化全面渗入象牙塔,知识分子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原先以启蒙为旨归的共同思想立场破灭,无力形成一种与自我身份相符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在生存境况的清贫与现实社会大环境对比造成的人性扭曲中,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体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显现出普遍的人格分裂,所以在难以预料的社会变迁中倍感焦虑”^[9]。例如《风雅颂》中的杨科,投身于《诗经》研究的他不论在职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显得无比失败,故乡和爱情也无法安顿其焦虑的灵魂,最终在一系列的碰壁中抛弃了世俗,事实上也被世俗所抛弃。而阎真的《活着之上》中的聂志远有着独立的知识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阳明等历史星空的伟大灵魂为楷模,开拓学术视域,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建树,可现实中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和人文学术的边缘化令他陷入困惑。为了获得进步,他只能改变自己的价值认定,不断地委屈自己,从而满

足职称晋升的条件,而这又导致他陷入更大的精神困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终极关怀上本身就缺乏超验的特质,而与儒家式的家国情怀与现实人生密切连接,一旦现实人生和生命情感追求失败,那么其依附的价值本身便容易遭到知识分子的怀疑,并最终将这种价值的混乱转变为价值的虚无,最终导致自我认同的焦虑。

三、“我到哪里去”的多样:新世纪文学的未来 虚拟与价值重判

新世纪文学带来的新质不仅体现在严肃文学在不同题材“存在焦虑”书写方面取得的突破,更体现为大众文学在“存在焦虑”书写方面的异军突起,并集中体现在对于未来“我到哪里去”的预测与认知上。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往往仅局限于对于新文学的主流——严肃文学的叙述,即使上世纪90年代一些文学史家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史著作进行修正,但基本上未能真正撼动严肃文学独占当代文学史的格局。但在新世纪“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三分天下”^[10]的全新文学格局中,文学史写作继续对严肃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保持沉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一些文论家指出:“非精英化成新世纪文学的重要表征”^[11]。如果说知识分子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那么大众文化背后,则是以往被我们忽视的“大众文学”^[12]。事实上,随着文学的人学本质日益深入人心、大众文学写作者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大众文学也日益脱离以往认知中生造噱头、炫弄奇巧的不良倾向,开始深掘人心,发掘人性,向“人的文学”主潮逐步靠拢。而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也开始试图发挥自己优势,在一些严肃文学尚未到达或难以到达的领域,建构属于自己的存在意义世界,这在一些科幻文学作品和青春写作作品中尤其明显。

关于新世纪的科幻文学,刘慈欣的作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与传统认知中的科幻小说不同,刘慈欣的《三体》不再单纯炫耀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匪夷所思的科技和壮怀激烈的大场面,《三体》的成功取决于其所构筑的宇宙终极关怀的成功,而这种宇宙终极关怀的着眼点,则是建立在深厚的人学基础之上的。刘慈欣在书中构建起一个相当具体也相当宏伟的异质文明——“三体”文明模型,人类与这一文明的相遇,正是源于书中人物叶文洁经历了“文革”疯狂年代中亲人、师生等情感的背叛以及人性的

邪恶后,对人性进行反思后采取的报复性行动。“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飘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外来的力量。”作品通过红岸基地向三体文明发出了求助的讯息,希望借助三体文明的智慧来救赎人类,就体现出鲜明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关怀。反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是反人类,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观照人类整体发展,思考人类整体命运,尽管这样的思路极端化后,会走向“降临派”那样的人性反面,然而,对于像叶文洁这样的“拯救派”来说,很难说他们的思考不是深思熟虑而真诚的。因此,这样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关怀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种人性启蒙的含义。此外,更具有超越意味的是,对于现代性所赖以存在的线性历史观、历史确定性,《三体》在终极关怀层面上也提出了强烈质疑。“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当这样的话语出现在作品中时,读者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反而以为自己是在阅读一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著作。但与后现代主义否认本质的做法不同,刘慈欣只是对人类历史的确定性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站在更高的角度,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宇宙法则。在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法则”中,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弱肉强食的森林,所有的文明都处于“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以及“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的法则之下,并受此衍生出的“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理论的制衡。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就成了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的投射,而由此建立起的“宇宙社会学”则处处可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巨大投影。作者看似在讲宇宙,实际上落脚却在于现实社会。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既持批判立场,也抱悲观态度。在刘慈欣看来,在物质文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新世纪,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逐渐缺失了从整体上对人类生活和命运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与深度。而《三体》则直面人类最真实的鄙陋,向人们宣示着人类自身的文化缺陷。小说意在批判,更在拯救,那“思接千载,视通

万里”的宏阔终极关怀与存在寓言,呈现出全息的宇宙图景、无垠的宇宙时空和沉重的历史批判。

与对于科幻文学的“类型化”认识相类似,长期以来,文学界对于青春写作的认识都停留在“幼稚”“青少年”“偶像化”和“商业性”等标签上^[13]。不能否认,这些标签确实概括了部分青春文学作家特定作品的创作风格与内涵,但随着文学的人学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以及青春文学作家生活阅历的增长与写作水平的进步,一些影响力较大的青春文学作家逐渐从模式化、主观化地抒发青春忧伤的叙事模式中走出,将自己的笔触深入人心,触摸人性,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搭建自己的文学世界。透过这些文学世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窥视在严肃文学叙事之外的“80后”群体的“存在焦虑”。这种“存在焦虑”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新世纪文学的“生活现代性”,即“现代性不仅是精神性和政治性的,更应包括基础性的物质生活要义在里边;进一步,我们还应把生活本身看成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14]。郭敬明的《小时代》是其从事文学写作以来篇幅最大的创作,也是郭敬明写作中商业化操作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作品叙述了四位从小感情深厚,却具有不同价值观、人生观和经济背景的女生,从校园走向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以及复杂人生遭际背后的人性冷暖。但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与其说郭敬明精心刻画的四位“时代姐妹花”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不如说她们所生活的都市上海才是这部小说从未出现却又无处不在的真正主角,整部小说便是郭敬明“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15]。在书中,郭敬明用语言堆砌出一个丰盛的消费品世界,各种世界名牌产品如走马灯般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充斥在叙述之中,而其中的人物不仅为丰富的物质所淹没,更被物品之上漂浮的能指所淹没。大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些过量出现的商品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但或许这正是郭敬明所追求的效果。与《子夜》所构建的“阶级上海”、新感觉派所构建的“都市上海”、《六十年的变迁》所构建的“革命上海”、王安忆所构建的“平民上海”不同,郭敬明所构建的“物质上海”与真实上海相去甚远。上层人的奢华生活、仅与极少数人相关的摩天大楼和高级酒店别墅构成了郭敬明的上海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这座上海被架空,既可以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座世界都市的投影,又是郭敬明心中的世界之都。在郭敬明所精心构建的这一文学世界里,个人的存在不仅与历史脱钩,而且与时代脱

钩,个人的全部生活体验与周遭的世界无关,而只与个人的体验有关,满足个人物质上和感情上的欲求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也成为郭敬明的终极关怀。这就是郭敬明为这部小说起名为“小”时代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就此止步,将《小时代》定义为一部商品拜物教的拜金指南,那无疑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郭敬明的圈套。事实上,细读这部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浮华的物欲世界背后,郭敬明的态度是苍凉的、也是否定的,这一态度不仅隐藏在诸多对于上海摩天大楼如魔影般的想象与书中人物毫无来由的忧伤情绪之中,也体现在郭敬明为书中人物安排的结局中。在一场可以落实于现实事件的大火中,书中大多数人物生命枯萎,“小时代”落幕,令人猝不及防,却真实体现了郭敬明另一层面上对于时代人存在的悲凉寓言:建立在消费和物质之上的个体世界尽管浮华无比,却又不堪一击,繁华落幕,时代剧终,留下的只是曲终人散和无可奈何的惆怅与悲凉。这样的悲剧无疑映射着时代的“存在焦虑”。《小时代》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80后”消费主义视野中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尽管在艺术上存在着巨大的瑕疵甚至是漏洞,但这并不妨碍《小时代》成为一部重要的作品,成为一代人在特定情境下的精神标本。

如果说郭敬明看到了消费主义时代人的存在的某种荒谬本质,却无力也没有勇气进行批判,那么韩寒在作品中则举起了批判的大旗,直接面对时代与人性的荒谬,提出了对新世纪中人的存在方式的质疑。在《一座城池》中,韩寒赋予书中的世界以形而上的意义,整个城池便是关于当今世界的寓言,是围困着“我”看似严整实则充满阴暗的社会。因为荒诞的原因,“我”与几个伙伴逃离上海,来到这座城市,但是与上海一样,这座城市仍然是一样的压抑与黑暗、阴险与丑恶。愚昧无知的群众、道貌岸然的公权力、随处可见的假冒伪劣包围着“我”,而“我”却在城池中无聊无目的地晃荡,小说的故事也无疾而终。在《一座城池》中,我们不难看到西方现代派作品如《等待戈多》《城堡》的影子,但这样的影子与其说是致敬,不如说更加直接地反映了韩寒对于现代背景下人类存在的焦虑思索。在书中,“我”来到这座城市一方面逃避责任,一方面追寻意义,但在城市经历了种种不公和欺诈后,“我”丢掉了当初的执着和梦想,如行尸走肉般与社会融为一体。《一座城池》在艺术上不能说是成熟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也谈不上独一无二。但其中所反映出的“逃离—追寻—失望”的人物情节模式,在韩寒的小说诸如《长安乱》

《他的国》《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一再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鲁迅“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小说模式,而小说中人物的不断追寻、不断碰壁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到鲁迅关于“无物之阵”的叙述。这一切都反映出韩寒在看似玩世不恭的青春写作中,事实上已经达到了某种有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这种关怀不再如严肃文学般直面人生,也不如同一些青春写作般逃避意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现代的荒诞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世纪中国“80后”青年的人性状态与“存在焦虑”。当然,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在表达自己的“存在焦虑”时也往往存在着某种理念先行的倾向,注重自己终极关怀的建构,而忽视了人物刻画的丰满程度,使得这种理念充满形而上的观念性,却无法落实于具体的人物形象,反映出青春写作在人的书写上虽然比严肃文学更加独特、鲜明,却无力继承严肃文学在书写人时的厚重、丰满。而这也从某种侧面为“80后”青春写作中人的书写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四、结 语

“文学艺术创作者,总是与其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意味着创作者永远要面临新的生活现实,而且永远要面对人生与艺术的双重困惑。只要创作者成为我们时代的生命探索者,那么,他就要永远供给人们新鲜独异的生命体验和审美自由想象的作品。”^{[3]398}不知不觉间,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十余年。十余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征。新世纪是一个现代性高度实现的年代,中国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现代性焦虑与新世纪中的若干现实具体问题相遇,体现为由内而外、由往而来的强烈的“存在焦虑”。这种“存在焦虑”是历史的,它促使新世纪文学用更具包容性的史观来观照近代以来我们走过的路,为现在何去何从提供更具说服力的阐释;这种“存在焦虑”是现实的,它促使新世纪文学立足中国社会在世纪之交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去扫描各阶层、各群体的身份认同焦虑,并用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去抚慰这种焦虑;这种“存在焦虑”也是未来的,它促使新世纪文学在特殊的题材发力,发表对于新世纪人未来存在或悲观或乐观的寓言,并借这些寓言去询唤一种关乎于人本体的终极关怀。同时应该意识到的是,这种“存在焦虑”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其本质具有一脉相承性,它投射在文学上时便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

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则是新世纪文学对“五四”以来所宣扬的“人的文学”的选择性继承和纵深发展。新世纪,“文学应该表现人性,优秀的小说作品应该很好地挖掘勘探复杂的人性世界,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文学的常识。”^{[4]18-19} 不论新世纪文学发生怎样深刻的变迁,文学的“人学”本质没有改变,这注定了它在反映“存在焦虑”方面必将有所作为。新世纪文学仍将在寻求新世纪的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道路上继续求索,为新世纪的中国人构建精神的家园。

参考文献:

- [1] 陈坚,王东宇.存在焦虑的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1):204-209.
- [2]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上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70.
- [3] 李咏吟.创作解释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4] 雷达.新世纪小说概观[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
- [5]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9-11.
- [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
- [7] 吴玉军.现代社会与自我认同焦虑[J].天津社会科学,2005(6):38-43.
- [8] 南帆.文学的乡村:双重主题、知识分子及其叙事焦虑(上)[J].杨子江评论,2018(4):14-22.
- [9] 颜敏.论新世纪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9-46.
- [10] 雷达.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J].文艺争鸣,2007(2):27-32.
- [11] 何振邦.文学的新世纪[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1.
- [12]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修订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83-223.
- [13] 吴秀明.当前文化现象与文学热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5-83.
- [14] 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与文脉——试论“中国现代文学3”[J].当代作家评论,2018(4):45-53.
- [15]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J].南方文坛,2011(3):5-10.

(责任编辑:顾克勇)